◎中华文明基因密码

戏曲：传承文脉 凝聚精华

□ 傅 谨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文脉中有特殊地位。无论从文化传统的继承还是文化建设的角度，戏曲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秦腔现代戏《西京故事》剧照

中华文化和艺术的卓越代表

戏曲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始终在中华民族文化创造中占据重要位置。尽管戏曲迟至两宋年间才诞生和成熟，却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的卓越代表和社会各阶层最喜爱的艺术娱乐方式。

戏曲广泛汲取与吸纳了其他成熟艺术门类的精华。中国的音乐、舞蹈在先秦已高度发达，两汉时期造型艺术进入成熟阶段，各种杂技、魔术类表演节目和歌舞小戏也出现在全国各地，隋唐以后逐渐形成了城市娱乐市场，以说书讲史为特点的叙述性说唱艺术活跃其间，吸引了无数观众。而戏曲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这所有成熟艺术融于一身，熔铸为集“唱念做打”为一体的高度综合性艺术。

提起戏曲，我们的记忆里就会响起那些耳熟能详的唱段，比如京剧《秦香莲》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上”，越剧《红楼梦》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黄梅戏《天仙配》的“夫妻双双把家还”。我们仿佛看到演员们轻盈的圆场、翻飞的水袖、英雄的起霸（戏曲表演程式之一，即武将上阵前所做的整盔、束甲等一套舞蹈动作）和少女的兰花指，还有武戏演员们精湛的功夫。这些高度技巧性的表演手段，都被戏曲巧妙地运用于表现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和感人至深的人物命运，因此才能让欣赏者为戏曲的魅力所吸引与感动，并同时获得各门类艺术全方位的享受。历史上，戏曲靠这样的优势，吸引了许多优秀的人才投身于戏曲的创造性事业中，涌现出大量代表中华民族艺术创作最高成就的经典作品。

京剧《秦香莲》剧照

中国地域广袤，山川交错，地理环境千差万别，文明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地域差别，营造出语言声调、生活习惯、性格特征等方面多样化的丰富文化景观。戏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剧种，其中既有在全国广泛传播的昆曲、京剧，更多的还是为当地民众偏爱的地方戏。它们遵循戏曲的普遍规律，在音乐、表演上又各有特色。其中，西北的秦腔、西南的川剧、岭南的粤剧、华北的梆子（包括豫剧、晋剧等），长江流域的汉调、徽戏，都有数百年历史。晚清民初从民间小戏演变成戏曲的剧种有江浙一带的越剧、安徽一带的黄梅戏，还有北方的评剧、华中的楚剧以及更具民间性的花鼓、秧歌、花灯、采茶……它们都有各自的传播范围，有的甚至在当地可与京昆抗衡。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戏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表现手法，具有完整的表演美学特征，在实际演出中与观众长期互动，建立了与民众情感世界的密切关联，成为中华文化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形态。

族群文化记忆的核心与基础

戏曲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浓缩与结晶。戏曲不仅在艺术形态与表现手法上是民族的，更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思想文化发展优秀成果的载体。戏曲不仅是戏剧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更凝聚着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所以在中国，戏剧既是万民参与的娱乐形式，更是族群文化记忆的核心内容与坚实基础。

戏曲史上那些杰出作品所包含与传递的精神文化内涵，在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观众，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建构中起着重大作用。中国传统戏曲一直在传递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鼓励每个人在追求人格健全与道德完善的同时，讲奉献，讲牺牲，舍己为人，崇善弃恶，更有对丰富情感生活的积极追求。

戏曲不是机械化、原则性地将这些抽象道德理念硬塞给欣赏者，它通过鲜活生动的故事内容与人物形象，凝练而传神地表现中华民族共同接受的伦理道德观念时，对生活深刻而生动的表现，必定触动欣赏者的情感与心理，使戏曲经典作品的功能，远远溢出伦理道德理念单纯的阐述与传播。一方面，它利用精彩的舞台表达，让欣赏者在感动中自然接受了传统伦理道德理念，逐渐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优秀的戏曲艺术作品总是让我们看到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自然就包含了伦理道德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戏曲题材广泛，既有厚重的历史叙事，也有温婉的情爱波澜。从先秦到当代，几乎所有中国历史上政治军事领域的重大事件，从武王代纣、楚汉相争、三国纷乱、隋唐水浒直到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都在戏曲作品的叙述范围；而哀婉悱恻的爱情悲剧如《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等等，更是跨越时空的杰作。优秀的戏曲作品充满奇谲瑰丽的风采，《牡丹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梦境中相遇的柳梦梅走进了现实，《探阴山》里包公出窍的魂灵遥视自己的身躯，《情探》里敦桂英愤而自尽为的是请判官替她主持公道……这些都是令人惊异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当然，戏曲里还有风趣幽默和滑稽调笑，有豪情万丈和义薄云天。戏曲塑造了那么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这些都是民族记忆的重要内容。

开放、宽阔、善于取长的艺术样式

在不同时代，戏曲都有极具时代性的创造。高则诚改编的《琵琶记》，是元末明初时重要的戏曲作品。作者深知文艺作品“乐人易，动人难”的道理，他通过汉唐年间就广泛流传的蔡伯偕、赵五娘故事，深刻揭示了士子在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选择，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明末清初，国破家亡的惨痛经历，催生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震撼力的戏曲经典，李玉的《千钟禄》借明初朱棣之乱，写汉建文帝在大势已去时从南京城仓皇出逃，他“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身似闲云野鹤，心同槁木死灰”，触发了无数观众的情感共鸣。无名氏的《铁冠图》直接描写明亡的经历，其中《刺虎》一折是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最钟爱的剧目之一。更可贵的是，它们和《长生殿》《桃花扇》一样，不仅擅长于在宏大的历史背影和急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刻画戏剧人物，还包含了对国家兴亡内外部复杂原因和历史教训的深刻揭示。

当下，戏曲依然是中国人喜爱的舞台艺术样式，并且在海内外获得高度情感认同。戏曲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贡献一直可圈可点。近年来，像秦腔《西京故事》、豫剧《焦裕禄》这样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都是当代文化建设的突出成就。

戏曲有许多值得骄傲与自信的优点，特别是它发展成熟的速度非常快。从整体上看，两宋年间才成型的戏曲，只过了百来年左右就进入了它第一个全盛时期。具体到单一的剧种，京剧从诞生到享誉全国只不过半个世纪，越剧从诞生到全盛只用了30年。这是由于戏曲艺术家们善于学习与吸收，不仅善于取其他艺术门类的优长为我所用，也善于迅速将其他剧种的艺术成果有机地化入本剧种整体美学架构；不仅善于继承自身的历史经验，同时也善于继承其他艺术门类的遗产甚至全人类的艺术创造。这一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宽阔的文化胸襟，是中国能够在近现代以来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文化基因。

戏曲史上留下的丰富经典作品是民族文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如果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那么，戏曲凝聚了传统艺术之精华，无疑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是当代文化发展与建设的核心课题之一，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戏曲必将做出新的伟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苏辙的品格

□ 李天保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士大夫的襟怀，也是他们的器识与宏愿。苏辙的士人精神和文化品格，正是这种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苏辙所处的时代，正是士族阶层消亡殆尽，庶族阶层积极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赵宋王朝的崇文政策，为出身庶族家庭的苏辙带来了机遇。其时，朝廷内有“三冗”问题，外有西夏、辽的威胁，苏辙与许多士大夫一样，心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之心，他说：“臣自少读书，好言治乱”（《自齐州回论时事书》）“其言语文章，虽无以过人，而其所认说，乃有矫拂切直之过”（《上曾参政书》），自谓其《历代论》“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历代论·引》），甚至还对真宗朝宰相王旦的做事行为提出批评：“（王）旦事真宗，言听谏从，安于势位，亦不以正自终，与（冯）道何异！”（《龙川别志》）

苏辙这些议论，都是他经世致用之心的真实流露。苏辙登上政治舞台后，积极活跃于北宋中期的政坛，并成为元祐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既不依附司马光等元老大臣，也不畏洛党诸人的攻讦，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朱子语类》）的精神。他在元祐之后，即使不被人主所用，处于贬谪的悲惨境地，也要著一家之言，以求有用于当世。他曾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历代论·引》）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苏辙这样的言行，正是宋代士人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苏辙画像

北宋中期，士大夫注重名节的道德意识很强烈。《宋史》言：“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苏辙在这种道德相尚、名节相高的士林风习中，注重自身的修养和人格完美。他在贬谪期间，以颜回的境遇激励自己说：“嗟哉古君子，至此良独难。口腹不择味，四体不择安。遇物一皆可，孰为我忧患……欲忘富贵乐，托物仅自完。无托中自得，嗟哉彼诚贤。”（《寄题孔氏颜乐亭》）苏辙在身处逆境之后，体味到了颜子“箪食瓢饮”的精神境界，于是以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鼓励自己。

苏辙推崇孟子，对其养成的“浩然之气”进行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吴氏浩然堂记》）在苏辙看来，作为君子，只有治心养气，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才能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的思想境界。

苏辙还常以“幽兰”来比喻自己高洁的品质，如“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草，丛倚修筠午荫凉。欲遣蘼芜共堂下，眼前长见楚辞章。”（《种兰》）兰之品质，超凡脱俗，似美人，犹君子。苏辙以兰自喻，说明其发自内心的名节情怀，是一种个体生命道德价值的安顿，在他尊崇颜回、孟子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这种道德情怀。

苏辙因为有了士人精神、时代精神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坚强支撑，他的文化品格便有了宋代士人的特质类型，即经世性、道德性和沉潜性。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家风家训

下庄杨氏：读书经商 惟敬惟和

□ 张俊峰

山西沁河杨氏祖先杨天衢，系金代乡贡进士，他的《得禅字》诗被收入清康熙朝《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流传后世，为人景仰。后自第十世杨荣胤开始，迭经十八代杨庆云、杨丽云、杨昱，十九代杨伯朋（清同治三年甲子科举人），二十代杨念先（光绪乙酉拔贡，1885年），二十一代杨兰阶（清末副贡生，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学监、斋务主任），“远自高曾，代以能书著称”，成为沁河流域名副其实的书香世家。

“杨念先示子书信十五”是光绪十九年（1894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年间杨念先给其子杨兰阶写的15封家书。这批书信生动地呈现出下庄杨氏在晚清的家庭经济状况和对子女们的严格教诲。书信的内容除了讲述家里经济困难，需要杨兰阶接济救助以外，大部分是嘱咐儿子的话。

嘱咐的话包括两类，一类是要杨兰阶多读书、习字，准备参加科考。光绪十九年六月初五日的信中讲，“汝在外公事之暇，时艺、小楷亦须留心，是一收心之一助也。”杨兰阶祖父去世前一天还计划给孙子写亲笔信敦促他要读书学习：“汝当于工余之暇，即当以时艺、小楷、试帖三者为急务，至于刻图章写大字行书，皆无须讲究。祖父往矣，所嘱我命汝三事，汝当奉为终身良药。”两代人的教导，言辞恳切，显示出作为书香门第的杨氏，重视子女读书教育的良好家风。在这样的家教之下，杨兰阶、杨兰第兄弟二人后来都在当时的国立山西大学教书育人，成为颇有名气和才气的知识分子。

第二类是要求杨兰阶为人处事要谨慎小心，不要喜形于色。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九日信中说：“且闻东家掌柜待汝过优，是又余之虑也。曷以？故因汝少不更事，闻誉必喜，得许易骄。喜而不损，骄而不殆者鲜矣，汝戒哉，必兢兢谦谦，庶保有终。”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廿二日书：“善哉，魏辛宪戒子之言曰：‘惟敬惟和，庶乃有济。’余亦愿汝廉抑小心，则亦庶少差忒矣。”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惟是吾儿齿弱任重，凡事总以谦恭谨慎为主，稍有疑难即留退步，与诸掌柜商榷，庶无关岱。”可谓言之切切，教子有方。

晚清时代的杨氏家族，尽管家境已经困难到不得不让孩子们外出经商，补贴全家开支，却并不放弃读书的理想。杨氏家书所揭示的，正是一个世代书香的家族在时代变迁中所秉持的优良传统。读书的目的首先是修身，做个有学问的人，才能在社会中立稳脚跟，受人尊重。这正是下庄杨氏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

（作者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